



21世纪史学系列教材
21st CENTURY HISTORY TEXTBOOK SERIES

中国史学史

乔治忠◎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1世纪史学系列教材

中国史学史

乔治忠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史学史 / 乔治忠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21世纪史学系列教材)

ISBN 978-7-300-14150-3

I. ①中… II. ①乔… III. ①史学史-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63787 号.

21世纪史学系列教材

中国史学史

乔治忠 著

Zhongguo Shixuesh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 - 62511242 (总编室)

010 - 62511398 (质管部)

010 - 82501766 (邮购部)

010 - 62514148 (门市部)

010 - 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 - 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28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26.5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97 000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一、史学史在认识论上的层次和特点	1
二、中国史学史的学术任务与研究内容	4
(一) 中国史学史的三大任务	4
(二)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八项内容	5
三、中国史学史学术体系的深层特征	8
(一) 学科内涵的完整性	8
(二) 学术前景的继进性	9
(三) 研究系统的开放性	9
四、建设中国史学史学术体系的作用和意义	10
五、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的回顾	12
(一) 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成立	12
(二) 1949 年之后史学史学科的发展	14
六、在中外史学的比较中探讨史学的发展机制	17
第二章 史学的起源与先秦时期史学的初步发展	22
一、史学产生的社会条件	22
(一) 人类社会对往事的记忆和追述	22
(二) 史学原发性产生的几项社会条件	24
二、甲骨文与金文的记事方法	25
(一) 甲骨文载事的方法和意义	26
(二) 青铜器铭文的史事记载	27

三、“殷鉴”——中国上古理性思维的曙光	28
四、史官职能的演变与官方记史体制的形成	32
(一) “作册”与“史”	32
(二) “殷鉴”观念下的历史文献	35
(三) 官方系统、连续性记录史事的起始与发展	36
五、先秦史籍概述(上)	38
(一) 西周、春秋时期成书史籍的类别	38
(二) 行于春秋时期而流传至今的史籍	40
六、先秦史籍概述(下)	47
(一) 以记言为主的《国语》	47
(二) 编年体通史《竹书纪年》	49
(三) 内容完备的编年史《左传》	50
(四) 战国时期的其他史籍	51
(五) 附论:《战国策》与《世本》等	52
七、先秦时期的史学发展状况与史学观念	54
(一) 先秦史学的发展状况	54
(二) 记史求真与以史赞治的观念	56
(三) 孔子与《春秋》相联结的史学意义	58
(四) 战国时期史学观念上的新拓展	60
第三章 中国古代传统史学基础的奠定	63
一、秦代史学意识的不绝如缕	63
二、西汉前期文化政策与史学的复兴	66
三、司马迁与《史记》	68
(一) 司马迁的生平事迹	68
(二) 《史记》的编纂形式与内容	70
(三) 司马迁的历史观念	73
(四) 司马迁的史学思想与历史编纂学	77
(五) 《史记》产生的社会条件	80
(六) 司马迁《史记》在史学史上的地位	81
四、班固与《汉书》	83
(一) 班固的撰史意旨与史学思想	84
(二) 《汉书》的成就与史学意义	86
五、两汉朝廷的记史方式	87
六、东汉官修《东观汉记》及其意义	88

(一)《东观汉记》的纂修	88
(二)《东观汉记》纂修的史学意义	90
七、荀悦的《汉纪》与传统史学基础的奠定	91
(一)荀悦及其撰著的《汉纪》	92
(二)荀悦的历史观念与史学理论	93
(三)中国古代传统史学基础的奠定	96
第四章 多方探索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史学	100
一、史籍编纂形式与内容的多样化	101
(一)史学蓬勃发展的原因	101
(二)编年体史书的编纂	102
(三)断代纪传史的撰述	104
(四)通史著述的尝试与地方史志及地理书的撰写	108
(五)人物传记与族谱编纂的繁兴	110
(六)史注、史论与史评的发展	111
(七)史考著述的超前出现	114
(八)典制史籍与杂记、故事的纂辑	115
二、各族政权官方的史学建设	116
(一)三国、两晋和南朝政权的史学建设	116
(二)十六国政权与北朝官方史学的建树	119
三、史学发展中的矛盾、冲突与磨合	121
(一)汉人政权内史学发展中的矛盾	121
(二)各少数民族政权史学建设中的矛盾冲突与磨合	122
四、传统史学对民族大融合的关键作用	127
(一)文化是古代中国民族凝聚力的核心	128
(二)传统史学对民族大融合的作用	129
五、历史编纂学上的探索	133
(一)几项史书体例与史学方法的讨论	133
(二)孙盛对编年体史书编纂方法的创树	136
六、历史观念与史学理念的进展	137
(一)正统论观念的凸现	137
(二)论治乱、辨兴亡的历史见解	138
(三)传统史学理念的巩固与发展	142
七、儒学、玄学与史学	146
(一)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学状况	146

(二) 玄学的状况	147
(三) 史学与玄学的格格不入	148
八、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互动运行机制的确立	150
第五章 隋唐至两宋：传统史学发展的成熟	155
一、隋唐至两宋史学发展的社会背景	155
(一) 隋代史学的开新尝试	156
(二) 唐宋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概况	158
二、唐朝至南宋的史馆建置与本朝史编纂	161
(一) 史馆建置与记史、修史制度	161
(二) 唐宋时期官方对本朝史的记述与纂修	165
三、纪传体正史的纂修及一般的私修史籍	171
(一) 纪传体正史的编纂	171
(二) 唐代至南宋的其他史书	176
四、刘知幾及其《史通》的理论建树	179
(一) 刘知幾其人与《史通》其书	179
(二) 刘知幾的思想与《史通》的历史编纂学主张	182
(三) 《史通》的流传与影响	185
五、杜佑的《通典》与郑樵的《通志》	186
(一) 杜佑及其《通典》的史学成就	187
(二) 郑樵及其撰著的《通志》	188
六、欧阳修之史学	190
(一) 欧阳修对史书的编纂	191
(二) 欧阳修的疑古思想	192
(三) 欧阳修的历史正统论	193
(四) 欧阳修的史学思想	195
七、司马光《资治通鉴》及影响	197
(一) 司马光的生平与《资治通鉴》的编纂	197
(二) 《资治通鉴》的内容及司马光的历史观念	198
(三) 与《资治通鉴》影响相关的宋代的编年史	199
八、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与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	201
(一) 朱熹编纂《资治通鉴纲目》	201
(二) 袁枢撰录《通鉴纪事本末》	203
九、历史考据学的成立	204
十、隋唐至两宋时期史学的成熟与缺陷	206

第六章 元明两代史学的调整与开新	214
一、元明两代的社会文化与史学观念	214
(一) 元代的社会文化	214
(二) “国可灭，史不可灭”理念的产生及其意义	215
(三) 明代史学的社会文化背景	217
二、元明两朝的官方史学	218
(一) 元朝官方修史概述	218
(二) 明朝官方的修史活动	221
三、胡三省和马端临的史学贡献	224
(一) 胡三省撰《资治通鉴音注》	224
(二) 马端临著《文献通考》	226
四、元明史家对史学的新探索	227
(一) 经世史书的多样化发展	227
(二) 域外历史地理撰述	229
(三) 历史考据学的新进展	230
(四) 史论与史评的进一步兴盛	232
五、普及性史学的发展与繁荣	235
(一) 普及性史书的兴起	236
(二) 明代史学的普及性潮流	237
六、中国传统史学的域外传播	243
(一) 中国史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影响	243
(二) 中国传统史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	244
(三) 日本仿从中国传统史学的修史活动	248
第七章 清代对传统史学的清理和总结	250
一、清初学风的转变与史学名家	250
(一) 明清易代与学风上的反思	250
(二) 清初的史学名家	252
二、清朝的修史制度及其特点	255
(一) 内阁、翰林院与修史制度	256
(二) 清朝的各类修史之馆	257
(三) 清朝修史制度的特点	257
三、官修《明史》活动及其影响	259
(一) 《明史》纂修的准备阶段	259
(二) 《明史》纂修的奠基阶段	261

(三) 官方纂修《明史》的中辍	262
(四) 《明史》纂修的成书阶段	263
(五) 官方纂修《明史》活动的影响	264
四、《大清一统志》的纂修与方志学的兴起	266
(一) 《大清一统志》的初修与方志纂修的兴盛	266
(二) 乾隆朝与嘉庆朝的重修《大清一统志》	268
(三) 清代方志纂修的史学意义	269
五、清朝官方史学的萌发、进展、繁荣和衰退	270
(一) 官方史学的萌芽和初步发展	270
(二) 官方修史基本格局的形成	272
(三) 清朝官方史学的繁荣	275
(四) 清高宗的史学思想	277
(五) 官方修史活动的衰退	281
(六) 清朝官方修史活动发展上的特点	283
六、乾嘉时期的历史考据学	284
(一) 清初考据学风的兴起	284
(二) 乾嘉时期的历史考据学家	285
(三) “乾嘉学术”的另一方面	290
(四) 乾嘉历史考据学的地位和影响	291
七、章学诚的史学思想	292
(一) 章学诚的主要史学创见	292
(二) 章学诚史学理论的三项根基	294
八、清代“盛世”史学的发展结构	297
(一) 官方史学的业绩	298
(二) 私家史学的发展及其特色	299
(三) 官员幕府的修史活动	300
九、清代官私史学的关系及传统史学的发展态势	302
(一) 唐朝至明代史学的官私互动	303
(二) 清代史学发展中的官私互动	304
(三) 清代史学在大总结之后的发展态势	307
第八章 中国近代史学的建立与发展	312
一、中国近代史学思想的前驱	312
(一) 经世致用思想的强化	313
(二) 外国史地学与中外关系史的兴起与发展	315

二、梁启超《新史学》与新式中国历史教科书	319
(一) 梁启超《新史学》理论的开拓作用	319
(二) 新式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兴起	323
三、近代史学理论的引进与探索	327
(一) 西方史学理论引进的扩展	327
(二) 中国学者关于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著述	329
四、“整理国故”与“古史辨”运动	331
(一) “整理国故”活动的形成与影响	331
(二) “古史辨”运动的史学革命意义	333
五、多样化的治史取向(上)	336
(一) 史学多样化状态的形成原因	337
(二) 维护传统文化的治史取向	341
(三) 移植或转述西方史学的治史取向	345
六、多样化的治史取向(下)	346
(一) 具有一定历史观的主导而仍作出认真研究的治史取向	346
(二) 构建先验性历史框架的治史取向	348
(三) 立足于考据的治史取向	351
七、近代史学的社会运行机制	359
第九章 近代史学发展的新生面	368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368
(一) 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早期输入	368
(二) 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370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与社会史论战	374
(一) 李大钊、蔡和森等人的理论探讨	374
(二) 中国社会史论战及其争论的焦点	380
(三) 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几点分析	385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革命史学”体系的构建	389
(一) 社会史论战的归宿	389
(二)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与“革命史学”体系的构建	392
课下参考文献举要	398
附录 史学吟	403
后 记	410

插图目录

图 1 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	13
图 2 结绳记事	23
图 3 云南沧源岩画，战争	23
图 4 土方𠂇	26
图 5 牧野之战示意图	30
图 6 《史记》	71
图 7 《汉纪》	92
图 8 《魏书》	107
图 9 《南史》、《北史》	126
图 10 《大唐西域记》	177
图 11 《史通》	180
图 12 宋江贽《少微通鉴节要》	201
图 13 《文献通考》	227
图 14 日本仿刻 7 卷本《十八史略》	246
图 15 故宫东华门内清朝国史馆旧址	275
图 16 1736 年郎世宁绘乾隆帝画像	277
图 17 《文史通义》	292
图 18 《新民丛报》	320
图 19 《古史辨》	336
图 20 整理内阁大库档案工作情形	339
图 21 《新青年》	370
图 22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382
图 23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396

第一章

绪 论

中国史学史作为一门学术专史，自近代梁启超等学者倡导以来，起伏而扎实地发展起来。自 20 世纪 60 年代初，特别是 70 年代末开始，在老一辈史学家白寿彝、尹达、吴泽、杨翼骧等先生的教学、研究及宣传、推动下，学术成果日益丰硕，逐步形成了一支比较稳定的专业队伍，学科重要性显现出来，因而受到国家教育与社会科学管理部门的重视，将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结合起来，规定为历史学学科体系中 8 个二级学科之一。^① 这为中国史学史的学科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是应当看到：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一定程度上还处于“冷门”状态，史学界仍有很多人对中国史学史专业的基本性质认识不清。因此，继续探讨中国史学史学术体系的理论问题，对于本学科的发展仍然很有必要。

治一学而不深观其历史演进之迹，是全然蔑视时间关系，而兹学系统终未由明了。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 3 章《史之改造》

一、史学史在认识论上的层次和特点

人们的社会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分为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二者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单从认识论角度而言，人类不仅在实践中需要对自然界的客观事物加以认识，而且需要对自身社会的认识。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逐步形成各门类的自然科学；而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则形成各种社会科学。其中历史学

^① 中国教学与研究的学科体系，即将由教育部门于 2011 年做出较大改动。

是对人类既往一切活动的认识，而且已经形成为系统的知识体系。

历史学在认识上的特点，除了范围极广而且统摄于一体的综合性之外，最明显的是动态回顾性与写实性。所谓“动态回顾性”，是指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既往的人类活动，而不是现实的和未来的事物。所谓“写实性”，是指历史学不仅要对研究对象予以概括和总结，还必须记述其客观的真情实景，而有条理、有体系地记述真实的历史场景，应当是历史学的基本的和主要的内容。从历史学的综合性、动态回顾性、写实性等三个认识特点可以看出：历史学是人类对于自身社会的一种特殊的反思，其最终目标不是将既往的一切用肢解的方式剖析，而是将之有序地活化起来，从而能够比实际的社会生活更清晰地展现其发展的本质。

人类理性思维总是具有两个相辅相成的认识方向，一是对客观对象的认识，二是对“自身”的反思。反思实际上是将“自身”的历程当作一个客观的对象来认识，历史学是一种反思的学科，而它本身也有其发生、发展的历史，同样会向内作自身的反思，史学史、史学理论就是历史学作出自我反思的系统性学问。历史学为了发展和日益完善化，进行史学史的反思是极其必要的。

古代伟大史学家司马迁在撰史的过程中，对于以往的史学状况有深入的反思，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他分析了孔子作《春秋》的背景、用意和作用，叙述了承《春秋》之意而撰写的《左氏春秋》、《铎氏微》、《虞氏微》等等史籍，以及战国时期诸子“各往往据摭《春秋》之文以著书”的现象，指出了“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① 的遗憾；《六国年表序》又指出“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② 的遗憾。因此，司马迁之所以立意撰写一部“原始察终”、“通古今之变”的通史，盖得之于反思以往史学状况而发现了其中的“不务综其终始”的问题，于是起而弥补之。唐代史学家刘知幾著《史通》一书，对既往史学发展作出理论性的反思和总结，其中《史官建置》、《古今正史》是带有史学史含义的专篇。刘知幾的论述，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

外国的史学，也是在总结前人成果和得失的基础上而有所发展，典型者如英国史学家 R.G. 柯林武德，其名著《历史的观念》除《导论》外共有五编，而前四编乃是评述自古希腊到西方当代的史学。因此，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研究，对于整个历史学的进步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历史学是对于人类社会的一种反思，那么史学理论、史学史则是对于历史学的反思，是一种新的、更深一层次的反思，是人类系统的思维活动不断深化、学术探讨不断进展的结果，是整个历史学蓬勃

^① 《史记》卷一四，《十二诸侯年表序》。

^② 《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序》。

发展的产物。

就史学史而言，中国与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相比，学科建设具有更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中国自古以来史学极其发达兴盛，其表现为：第一，历史记载和历史著述在时间上连续不断，从上古直至晚近，各个时期都有相应的史书；第二，史籍不但内容丰富，而且形式多样，形成同一时段内多种形式、多种内容范围的史籍；第三，史学与政治联系紧密，史学的社会功能明显，史学直接成为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活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第四，史家群体成员广泛、队伍庞大，从皇帝、官员到平民，从文人、学者到武将，撰史者都不乏其人；第五，史学活动主体的非单一性，即官方和私家皆热衷修史；第六，中国古代官方、私家都对史书义例、史学方法、修史制度等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探讨，积累了丰富的思想资料。诚如梁启超所言：“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① 这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发掘不尽的素材、永不局促的天地。其他单一的民族和国家缺乏成熟的史学史学科体系，或无大碍，中国若不重视史学史研究，则为学术结构的一大残缺。

史学史是历史学发展的后续的学问，是又一层次的反思。但是却与历史学具有同样的综合性、动态回顾性、写实性等认识特点。认识特点的相同，决定了研究方法的近似，这使一般历史学者感到可以方便地作一些史学史性质的研究，如研究断代史的学者能够研究该朝代的史家、史书和史学现象，促使史学史的学术成果因素增多。然而，史学史与整个历史学的认识特点相同，也造成一些问题和误解。自从梁启超提出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建议，在学术上有所发展的同时，史学界也出现各种异议，有人认为史学史算不上专门学问，历史学者人人皆可撰述；有人认为中国史学史已经出版著述，特别是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面世之后，再无继续研究的必要了。^② 如此等等，皆源自对史学史的学科性质认识不清，而深层的原因，盖由于认识特点和研究方法的类同，而觉得史学史不必成为相对独立的学术门类。不少史学家在大声疾呼重视中国史学史专业时，提出过“大学哲学系以哲学史为必修课，中文系以中国文学史为必修课，为什么许多历史系却不将中国史学史作为必修课”的问题，现在这种状况依然存在。究其原因，哲学史、文学史乃以历史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具有动态回顾性和写实性的认识特点，这与哲学、文学本身明显不同，从而容易认定为一门独立而必要的学科，史学史与历史学之间则不具备那样明显的区别，其区别在于认识对象的不同并且处于不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2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1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② 此据业师杨翼骧先生1993年9月《谈治学与做人》的讲话，参见杨翼骧：《学忍堂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2。

同的反思层次，然而这是不易引为注意或容易被忽略的。朱杰勤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竟将近代人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等编入讲述，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稿》将清朝官方纂修的《明史》放在明代史学中论述，都是一不留意即把历史研究的史料误作为史学史的研究对象，混淆了史学史与一般历史学的区别。由此可见，即使是功力深厚、成就突出的史家，也需要对史学史在认识论上的层次和特点、对史学史与一般历史学的区别及联系、对史学史的研究对象与学术体系作认真的理解，才能写好中国史学史的著述。

二、中国史学史的学术任务与研究内容

作为一种学术门类，史学史是研究历史学发生、发展和各个时期史学活动状况及其与各种社会因素相互关系的学科，它有着清理史学遗产、阐明史学演进过程、揭示史学发展规律的任务。中国史学史就是把演进的范围大体规定在中国的范围之内，清理我们祖国自古以来的史学遗产，阐明中国史学的演进过程，揭示中国史学发展的特有规律。

史学史是研究历史学发生、发展与各个时期史学活动状况及其与各种社会因素相互关系的学科，它有着清理史学遗产、阐明史学演进过程、揭示史学发展规律的任务。

（一）中国史学史的三大任务

（1）清理史学遗产，这是史学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我国是史学遗产最为丰富的国家，多种体裁、多类内容的史籍浩如烟海，古代散见于经部、子部、集部诸书中的历史评论、史学批评、史学议论多不胜收，近现代发表于报刊的史学撰著绚丽多彩，这是卓有中国特色、富于理性精神的文化财富。清理这些史学遗产，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尽管前人已经取得很大成绩，但仍然是今后史学史研究的一项重要的工作。清理史学遗产包括这样一些工作内容：搜集、发掘各种类型的史学著述以及相关资料；分析历史著述的内容和形式；考察史籍的史料来源、撰述过程、可信程度；探寻历史著述蕴涵的史学观点、思想倾向等。这是一项有考订、有分析、有评价的综合性工作，因此可能取得很显著的研究成果，但它对于整个史学史研究来说，大部分是属于一个个“点”上的工作，与历史文献学、断代史研究的某些选题，有时是类似的和交叉的。

（2）阐明史学演进过程，是在清理史学遗产的基础上进行的，其任务是将历史学的产生、发展和各个时期的基本状况，予以条理化、系列化的叙述与评析，这就要求把清理史学遗产的各个知识“点”联结成包括时间先后在内的有序的线

索。这不等于是各个“点”的简单相加，而是充满了对不同或相同时期史著、史家、史学现象的对比分析和总结概括，指出其间的联系以及与社会环境间的联系，剖析活跃在史学发展中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评述史学的社会作用，对于有代表性的、开拓性的史家和史书，予以重点的研究。总之，要表述出关于史学发展进程的连续的实景、系统性的知识和精湛的评析。阐明史学的演进过程，才使史学史研究真正具备独立学科的性质，从而与目录学的史籍解题、人物传记中的史家介绍以及其他相邻学科区别开来。

(3) 揭示史学发展规律，是史学史研究的重要任务。历史学是一种学术、一门学科，它反映的是既往的社会文化活动，因而史学的发展要受到社会整体条件的制约，还会受到政治、哲学等上层建筑及其他社会意识的影响。但历史学的系统一经形成，它的发展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有它内在的动力，而且参与到整个社会的运转机制之中。揭示史学的发展规律，就是要探讨史学发展的社会条件与内在原因，剖析历史学在不同阶段的运行机制，这需要在史学史研究相当深入的基础上，通过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来逐步解决。

这三项任务不是互相分离的，前项是后项的基础，后项是前项的指导，各项任务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只有对史学遗产作出一定程度的清理，才能较好地阐述历史学的演进过程；对史学演进过程有了比较清晰的理解，才能探讨史学发展的规律；在对史学规律的探讨中，才能更深切地理解史学从古至今的演进。

纵观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先秦时期是史学产生与初步发展阶段；秦汉时期至东汉末年，中国传统史学的基础得以奠定；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史学多方向探索发展途径的阶段；隋唐五代以及两宋时期，中国传统史学达到发展成熟的阶段而同时出现较多的矛盾；元明两代，史学的发展有了调整和新的探索；清代在整个传统文化总结和清理的背景下，史学也表现为大清理、大总结的特色；20世纪初，中国史学开始了向近代转型的进程，此后史学发展呈现思想、理念、治史取向的多元化状态；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乃是近代史学发展的新生面。

(二)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八项内容

中国史学史的学术任务，是对研究者提出的要求和由浅至深的阶段性目标。任务明确之后，可以将中国史学史研究应当关注的内容，以分类分析的方式归结为历史观、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官方史学及其相关的制度与举措、史家的史学活动、史学评论、史学与其他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史学发展的社会运行机制八个方面。

(1) 历史观，是对历史的概括性看法，其系统化为历史哲学，回答诸如历史是否发展进步，历史变化发展的原因和动力，历史的变化发展有没有规律性等一

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严格说来，历史观在整体上不属于史学史的研究范围，但是，在历史上曾经形成思想潮流的历史观，如中国古代的“五德终始论”、“正统论”等，对史学的发展极有影响，史家的历史观也制约着他的史学活动，这些都是史学史研究不应回避的。因此，史学史将历史上对史学造成很大影响的历史观以及重要史家的历史观，作为本学科的研究内容之一。

(2) 史学思想，是对历史学本身的一种认识，涉及历史学的性质、功能、治史目的以及与此相关的方法论问题，例如撰史目的是作为“名山事业”还是经世致用？史学的功能有哪些？史家必备的条件和素质是什么？关于历史记载求真与求用的关系等等。这些多为理论层面的问题，但古代的史家和学者，其见解和论述往往是零散、片段的，有的甚至没有直接的论述，而是通过历史著述间接地表现出来，这需要通过史学史的研究加以发掘和整理。史学思想与历史观是不同的范畴，前者的认知对象是史学，后者的认知对象是历史，史学界存在着将这两个概念含混使用的现象，是应当纠正的。

在史学史上，各种史学思想也有一个从零星的、个别的认识到逐步完善化、系统化的发展过程，而史学思想一经形成体系，即成为一种史学理论。史学思想的概念内包含着史学理论，史学理论是系统化表述出来的史学思想，因此，史学史应当将各种史学理论的形成、发展的进程及其原因纳入其考察的范围。

(3) 历史编纂学，是关于编撰历史著述的具体方式、方法的学问，它所解决的是史书如何更好地表现客观历史内容的技能问题，这既涉及史书的编写形式，又涉及史书的内容取裁和文字技巧，如史料的整理、鉴别和筛选，史书的结构安排，史文的斟酌修饰等等。这其中有些常被人视为历史文献学、“史料学”的内容，而从史学史角度出发，乃将之视为编纂史书整体工作的一部分，皆归属于历史编纂学。我国自古代以来，历史编纂学的成就异常丰富，有精细的搜集、鉴别、选择史料的经验，有多种形式的史书体例，这使历史编纂学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中占有很突出的地位。

(4) 官方史学及其相关的制度与举措，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史学现象。早在先秦，中国官方就有了自觉的记史体制，至迟从东汉起，官方已从记史发展到同时修史，官方修史活动连续不断，修史机构和修史官职逐渐成为国家官僚机器的组成部分，官修史在史学遗产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官方形成较为稳定的史学思想与修史规则，这是西方古代史学所不具备的特点。中国的官方史学，包括历代史官建置、史馆机构，官方史学思想，对修史的规范性规定（其中含有针对私家修史活动的干预），官方历代修史的具体过程和具体措施，官方运用史学和历史知识于政务的举动等等。这些内容，不仅史学史研究无可回避，而且也是中国断代史、通史、政治制度史、政治思想史所必须关注的，缺少这种研讨，上述各项历